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Villette

维莱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夏·勃朗特著
吴钧陶 西海译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Villette

维莱特



〔英〕夏·勃朗特著 吴钧陶 西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莱特/(英)勃朗特(Bronte, C.)著;吴钧陶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2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书名原文: Villette
ISBN 7-5327-2457-3

I. 维... II. ①勃...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637 号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维 莱 特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吴钧陶 西 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三印时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25 插页 5 字数 568,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2457-3/I·1436

定价: 27.40 元

译 本 序

1852年11月里寒冷的一天,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布拉德福市哈沃斯村教区牧师巴特里克·勃朗特先生的寓所里,牧师的女儿,这时已经以笔名柯勒·贝尔蜚声文坛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写完了她的小说《维莱特》的最后一行。她搁下笔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后来她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写完后,作了一次祈祷。究竟写好了还是写坏了,我不知道;任凭天意吧!现在我要努力平静地等待结果。”

这时,夏洛蒂年方三十六,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杰作《简·爱》(1847)和颇受欢迎的《谢利》(1849),年龄和事业都是如日方中之际,应该有漫长的锦绣前程等候着她,却不料《维莱特》已是她的绝唱和绝笔了。两年以后,她与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 Bell Nicholls, 1818—1906)结婚,结婚前后动笔写小说《爱玛》,未能完成,只三十九岁,婚后只九个月便受疾病折磨,留下几章残篇,便于春寒料峭的3月31日匆匆离开了人世。

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原像多数乡村牧师家的生活那样,是清寒的;如果不是迭遭变故,倒也融融泄泄,乐在其中。但是,夏洛蒂六岁时,三十八岁的母亲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姨母来家照料六个孩子,终未能慰抚孩子们丧母之痛。两个姐姐、夏洛蒂和一个妹妹被送往教士女儿学校住读,学校里恶劣的条件和过分严厉的管教,对幼小的心灵只能投下暗影。还不仅如此,两个姐姐不久以后都得了肺结核,先后夭折。这些,在《简·爱》一书里都有着令人伤心落泪的反映。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辍学回家以后,和弟弟勃兰威尔、最小的妹妹安妮一同长大。弟弟后来一事无成,自甘堕落,浪掷了自己的才华,也辜负了家人的希望。

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对于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着共同的爱好，终于都登上文坛，成为杰出的文学家。

三姐妹于1846年用笔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夏洛蒂的《简·爱》于1847年由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出版以后，艾米莉的名著《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也于同年由纽比公司以作者负担一部分费用的苛刻条件出版。第二年，安妮又出版了小说《女房客》。

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顾这一门三女杰的辛勤劳动，让她们可以采摘甜蜜的果实了，却不料从1848年的秋天到1849年的春天的八个月之内，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三人相继在青春年少时死于结核病。

夏洛蒂的《谢利》写到三分之二的地方，正是家中惨祸连连的时候，她不得不暂停写作，过了一阵才强忍悲痛，勉力续完。

在她写作《维莱特》的一年间，可以想见亲人们的死亡的阴影是如何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还要加上一句是，他们的姨母也早已于1842年死于他们家中。人去楼空，教会提供的两层八间的牧师寓所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爱独居一室的父亲、一个女仆和夏洛蒂三人。在荒原深处，墓冢丛中，教堂对面，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室外狂风呼啸，室内炉火闪忽，夏洛蒂伴着孤灯，形单影只，奋笔疾书，此情此景，该是什么况味！她们三姐妹原来有个习惯，在晚饭后绕着餐桌踱步，一个跟着一个，一面走，一面交流写作心得，互提意见。两个妹妹去世以后，夏洛蒂依然保持这一习惯，绕桌而行但已无人可以交谈，不闻欢声笑语，却只有自己的脚步敲击那石块铺成的冷冰冰的地板登登之声了。

这样的写作背景，这样凄凉寂寞的心境，不可能不反映到她的作品《维莱特》中来，何况这部书的内容比起夏洛蒂其他几部小说，带有更浓厚的自传色彩。

《维莱特》的女主人公露西·斯诺从许多方面看来，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真实写照。露西的经历如果说并不完全等于夏洛蒂的经历，却应该说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夏洛蒂的主要经历；同时，露西用第一人称对读者所说的话，应该看做夏洛蒂对世人倾吐的心声。

夏洛蒂把女主人公的姓氏称做“斯诺”是有含意的。1852年11月6日，作者致函出版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说到女主人公的姓名，我

几乎无法解释,是怎样一种微妙的意念使我决定给她起了一个冷的姓氏……她必须有一个冷的姓氏……因为她有一副冷冰冰的外表。”原来“斯诺”的原文 Snowe(=Snow)是“雪”的意思。作者一度曾使女主人公改姓 Frost,意为“冰霜”,同样是寒冷之意。参照作者的经历看来,当不仅指她的外表,很可能还指她的遭遇和她的内心。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夏洛蒂还说:“除非我错了,这本书的情调将从头到尾是比较低沉的。……她也许会被看成是病态的、软弱的……而任何人如果过着她那种生活,都必然会变得病态的。”

书名“维莱特”的原文是法文 Villette,乃“小城”之意,英国人用这个字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夏洛蒂用这个字暗指布鲁塞尔,正如她在书中用“拉巴色库尔”(Labassecour,“农家场地”或“晒谷场”)暗指比利时一样。原因当是作者要把故事的真实背景弄得模糊一点。从1842年到1844年,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读书并兼任英语教员。这是夏洛蒂一生唯一的一次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大陆。初渡英、法之间的海峡的时候,是她父亲陪送她和艾米莉前去的,费用由姨母资助。不到一年,姨母病故,夏洛蒂和艾米莉奔丧回家。在埃热先生来信盛情催请下,夏洛蒂再次只身返回布鲁塞尔。前后两年,夏洛蒂在法语、德语和文学修养方面大有收获。意想不到的,在感情问题上,竟然也给她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恋情。她所以要写这部小说,所以要把这部小说叫做《维莱特》,显然是事出有因的。

这一段恋情,当时和后来都鲜为人知。如果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可能会永远湮没无闻。据说,夏洛蒂去世以后不久,为她写出第一部传记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向有关人士搜集资料时,对此事是知道的,但是为了不使尚活在世上的人难堪,为了不使她的朋友夏洛蒂本人的形象受损,故而在传记中略而不提。

事情是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学习期间与康斯坦丁·埃热(Constantin Heger, 1809—1896)先生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埃热先生的第一位夫人死于1833年,他的第二位夫人(娘家姓Parent)克莱尔·卓埃(Claire Zoë)·埃热(1804—1890)是夏洛蒂求学时的校长。埃热先生主要在学校东隔壁的一所布鲁塞尔王家中学担任文学教授(在比利时,对资深中学教师也称教授),同时也协助夫人治理



自己的学校并且授课。埃热先生为人热情,充满活力,学识渊博,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在夏洛蒂和艾米莉初来的时候,给予帮助,特为她们辅导功课。不久,夏洛蒂在学校里学习的同时,还担任了英语教师,并且为埃热先生和他的妻弟补习英语。从现有的材料看来,他们之间不过是如此这般的泛泛的关系。1842年5月,即夏洛蒂和艾米莉到达布鲁塞尔之后的三个月,夏洛蒂给她童年时的学友,后来成为终身挚友埃伦·纳西女士写的信里,这样形容埃热先生:“他是修辞学教师,一个智力雄厚的人,可是脾气异常暴躁易怒,一个矮小黝黑的丑八怪,一张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有时他借用一只发疯的雄猫的模样,有时又借用一头癫狂的狼狗的神态,偶尔,但很罕见,他抛开了这些危险的诱人的表情,采用了一副距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相去无几的风度。”从这些不大恭敬的言词看来,夏洛蒂这时不像对埃热先生有多少好感。但是,过了一年,夏洛蒂在给她的弟弟勃兰威尔的信上,抱怨在这个异乡异国人际关系“虚伪透顶”,不懂什么是友谊的同时,却说:“唯一一个例外是那个黑天鹅,埃热先生。”从“丑八怪”一跃而升为“黑天鹅”,岂不是像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这里,岂不是透露了一些什么信息吗?

另一方面,埃热先生比他的第二位夫人年龄小五岁;那所学校看来又是这位夫人的资产;如此“屈居人下”,如果他感到“压抑”的话,便很有可能主动接近夏洛蒂,引为红粉知己。

当然,不能忘记,当时是十八世纪,当地是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学校。校长埃热夫人矮矮胖胖,彬彬有礼,但是神态冷峻,不苟言笑,一贯以严格的效率领导学校,以不断的监督对待师生。在《维莱特》里,夏洛蒂按照她的模型出色地创造出一位贝克夫人,可以想见埃热夫人管理下的学校的大致的环境氛围。因此,夏洛蒂和埃热先生之间的关系想必不是那种浪漫的师生之恋,而多半如夏洛蒂在《维莱特》里所描写的露西·斯诺和保罗·伊曼纽埃尔之间那种精神上的互相吸引、心灵上的彼此接近和沟通,但事实上是只有绝望和痛苦的那种交往。

夏洛蒂身材娇小瘦弱,但是性格坚韧刚毅,很有主见,再加上长期艰难和孤独生活的磨练,她是一位深情而又不易动情的人。她这时二十六岁,在来布鲁塞尔之前,曾经在家乡拒绝过两位求婚者,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在这样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向一位不适当的对象打开了心扉。

恐怕只能说是盲目的爱神向她盲目地射出了一支金箭吧。

尽管夏洛蒂竭力自我克制,尽管表面上维持正常的师生关系,但是既然心中燃起了恋之火,总不免有外露的迹象。勃朗特研究家玛格丽特·莱恩在《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写道:“埃热夫人敏锐地注意到那个英国女教师对教授的反应过分冲动,过分带感情意味。她不喜欢热情,对这种歇斯底里,无疑也有过充分体验。……当然,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无以名状、不知不觉的妒意也在起作用。夏洛蒂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冷淡,正如埃热夫人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不适当的热情。”

大概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处境的尴尬,避免埃热夫人猜疑和冷漠的目光,以及治疗那难以忍受的孤独之感、思乡之情,夏洛蒂于1843年10月向埃热夫人表达了离校回国的意愿。不料,一如夏洛蒂给埃伦的信上所说:“埃热先生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怒冲冲地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不能走。”直到这年年底传来消息,说夏洛蒂的父亲快要双目失明了,这才给了她脱身的充足的理由。

可是一颗动了真挚的感情的心,并不因为它的主人身在何处而情况有什么不同。对于夏洛蒂说来,回到家乡,从此永不相见,反而使思念之情加上生离死别之苦,一如火上加油,而更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书信才能够慰情聊胜于无。这些信必须是可以公开的,因为是写给一位有妇之夫;但又必须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渴念和爱恋,因为这才是写信的真正目的。夏洛蒂以自己非凡的才华尽力这样做,然而纸包不住火,从一些字句,从字里行间,明眼人和旁观者是容易知道此中深意的。不知这些信共有多少,但是极其偶然、极其戏剧性地被保存下来的是四封,流传后世,让人得知湮没了许多年的这段隐情,也让研究者和读者得知夏洛蒂写《维莱特》的背后,实际上有着这样一段不幸的背景。

信是写到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去的,可见夏洛蒂并不有意避开埃热夫人的“监督”。后来埃热先生要求把信寄到自己任教的那所中学,可见他遇到了“麻烦”。夏洛蒂觉得这样做不妥,便从此中断了通信,可见她认为自己光明磊落,不想背着那位夫人暗诉衷曲,而且很可能当局者迷,她认为这些信只不过是普通的、或稍稍越过“普通”的师生间的通信而已。

四封信被保存下来的曲折经过是这样的。

据说，埃热先生接读夏洛蒂的来信以后，便撕作废纸，随手扔掉；埃热夫人却颇有心计地悄悄拾起来，用线缝缀并且裱糊好（从一本传记书上的一张图片上可以看出），藏在自己的首饰匣子里。埃热夫人死去多年之后，埃热先生才发现这些自己扔掉的信，很是惊讶，便再次扔去，却又被他的女儿拾起来珍藏。直到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夏洛蒂一家及埃热先生都已先后作古，埃热夫妇的子女也已到了老年，他们觉得这四封信是举世闻名的作家的珍贵手迹，便于1913年拿了出来，捐赠给不列颠博物馆，《泰晤士报》于同年7月29日将法文原信全文发表，并附英文译文。这时，已是这些信件书写日期的六十八年之后了。

夏洛蒂在信中说：“日日夜夜，我既不能休息，也不得安宁。……我梦见你，老是疾颜厉色，老是乌云满面，老是冲着我大发雷霆。……如果我的老师全部收回他对我的友谊，我就毫无希望了。”“我曾经试图忘掉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认为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而当一个人忍受这种焦虑心情达一两年之久，只要能回复心情的宁静，他是在所不惜的。我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我找事情做，禁止自己享受谈到你的快乐——甚至对艾米莉都绝口不谈。……我食无味，寝无眠，憔悴消损。”

夏洛蒂心中沸腾着多么热烈的感情，又忍受着多么痛苦的煎熬，真是跃然纸上。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者认为文艺是被压抑欲望的升华。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些话有多少道理，或许值得探讨，但似乎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夏洛蒂写作这部小说《维莱特》的动机。

她的动机，其实在那四封信的第一封信里就初露端倪了。那是1844年7月24日给埃热先生的信，上面说：“若是我能写作，我就不会感到空虚无聊。……我要写一本书，把它奉献给我的文学老师——我唯一的老师——奉献给你。”

不过，夏洛蒂从布鲁塞尔回到家乡哈沃斯以后，开头做的是与妹妹们积极筹备在家中开办招收四至六名学童的寄宿学校的事。她去比利时求学，原来也是为自己办学当教师打基础的。无人报名，办学未果，她们才转向文学事业。在三姐妹诗集出版以后，夏洛蒂于1846年写成

的第一部小说是《教师》，而不是《维莱特》。《教师》同样以布鲁塞尔为背景，写一位英国男青年前去做教师，与一位外国女学生恋爱而终成眷属。这部小说当是为献给老师而作的，可惜被认为失之平淡，不合人们流行口味而被出版公司六次退稿，后来又遭三次拒绝，夏洛蒂生前没有见到它的出版，直到1857年，即她逝世后两年，才得以问世。

《教师》受到的冷遇，终于由《简·爱》和《谢利》的巨大成功弥补了。但是夏洛蒂依然不能忘情于她在布鲁塞尔的那段经历。早在1847年12月14日，她就曾在信上对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我的愿望是重写《教师》，尽量弥补其不足，删除一些部分，扩充另一些部分，把它变成一部三卷小说。”结果便是她这部动笔于1851年夏，完成于1852年冬，出版于1853年初的杰作《维莱特》。作者也许担心这部作品会像《教师》那样不受出版者欢迎，所以在完成之后作了祈祷，仿佛不那么有信心。

与《教师》比较起来，《维莱特》的篇幅增加了一倍有余，人物大大增加，内容也丰富复杂得多，已经完全不是局部的改写和增删，而是另一部有独创性的小说了。不过写的仍然是叫做“维莱特”的布鲁塞尔，仍然以一所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为主要情节。把《维莱特》看做是一部李代桃僵的作者心心念念要奉献给她的老师埃热先生的一部作品，大概并不为过。

露西·斯诺是《维莱特》里最主要的人物，她自始至终向读者叙述故事，倾吐心曲。另一位主要人物保罗·伊曼纽埃尔，即在外表上和性格上都经过化装却仍然依稀可辨的那位埃热先生，在小说的第一、二卷里却不占主要地位，直到第三卷里才同露西和贝克夫人，即埃热夫人的化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演出可歌可泣的一幕幕，直到悲剧性的终场。

在第一和第二卷里的主要人物，除露西和贝克夫人以外，则是约翰·格雷厄姆·布列顿医师、波琳娜·玛丽·霍姆小姐、姑妮芙拉·樊箫小姐和阿尔弗莱德·德·阿麦尔上校等等。他们之间交织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露西暗暗地爱上了约翰医师；约翰迷恋的是姑妮芙拉；爱虚荣的姑妮芙拉却选中那位游手好闲的有贵族头衔的德·阿麦尔上校。到全书近尾声的时候，约翰与波琳娜（据知其原型是盖斯凯尔夫人的小女儿朱莉娅）结合成幸福的一对；姑妮芙拉与那位上校私奔远行。

贝克夫人一贯不动声色地执行她明察暗访、严格管教的校长任务。露西遭受的则是命运对这位孤独无依的少女的种种折磨。

这第一和第二卷之中，同样反映了作者夏洛蒂的亲身经历。比如马趣门特夫人之死，使人联想到作者姨母之死；比如露西初至伦敦，渡海去“维莱特”时的感受；比如以一个信奉新教教徒的身分到天主教堂里向神父忏悔的描写，在夏洛蒂于1843年9月2日给艾米莉的信上就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地方，夏洛蒂和露西已不分你我了。至于用大量笔墨描绘的那位年轻有为、英俊文雅、惹人喜爱、责任心和事业心都强的约翰医师，据知同样是实有其人，呼之欲出的。此人便是出版过夏洛蒂几部作品的伦敦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业主乔治·史密斯先生。夏洛蒂是从布鲁塞尔回到英国以后，写作成功，才成为一名作家，并与史密斯先生有了交往的。但是在《维莱特》里，作者把这一段经历的时间、地点和背景都作了移花接木的艺术处理，搬到先于此时的“维莱特”去了。夏洛蒂生平五次去伦敦，或为文稿出版事宜，或受史密斯邀请参观博览会什么的。每次，这位出版家都盛情款待，有时夏洛蒂住在他们颇为舒适讲究的家中。夏洛蒂性格内向，木讷寡言，不善也不爱交际，但是史密斯还是把她带领到一些社交圈中。她在此时认识了萨克雷、卡莱尔、盖斯凯尔夫人、罗杰斯等名作家、诗人，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名流。宴会、观剧、参加音乐会、参观不列颠博物馆的画廊等等节目，主要也是这位史密斯先生的热心安排。他还与夏洛蒂去爱丁堡远游。交往密切，通信也频繁，看来夏洛蒂对乔治·史密斯颇有好感；史密斯先生的热心和殷勤似乎也超过一位出版公司业主同其投稿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外界有了一些猜测。不幸的是，史密斯的母亲对这样的关系不表赞同，夏洛蒂也觉得年龄不相配，对自己的容貌和家庭经济情况又有自卑感。1850年6月21日，夏洛蒂在致她的女友的信中，回答询问时说：“乔治和我彼此十分了解，十分真诚地相互尊重。我们双方都明白，岁月在我们之间造成多么大的差距。……我年长他七、八岁，更何况我绝不以美貌自居，如此等等，都是最安全的保障，哪怕同他一道去中国，我也无所顾忌。”

话虽如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并非一般，夏洛蒂的心中不免又添一层怅惘。不过，史密斯并没有像埃热那样使夏洛蒂产生伤感和痛苦的心情。在《维莱特》里，史密斯母子以布列顿母子的面貌出现，露西默默地

爱慕着约翰·格雷厄姆·布列顿医师,但是祝福他能够与波琳娜永结同心,幸福地过一生。这一创作意图,夏洛蒂在将《维莱特》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手稿寄交史密斯先生以后,于1852年11月3日的信上有明确的说明:“露西不该嫁给约翰医师;他太年轻、英俊、开朗、和蔼;他是大自然和命运的‘鬚发的宠儿’,应该从生活的彩票中抽得一张奖券。他的妻子应该年轻、富有而漂亮;他应该得到莫大的幸福。如果露西要嫁人,她应该嫁给那位教师……”

在这部小说里,夏洛蒂给波琳娜和媼妮芙拉都安排了各方圆满的结局,但是给主角露西安排的却是一个可悲的终场。这本来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符合作者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然而她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一部小说最后在他心头留下凄凄惨惨的印象,要求他的女儿让露西也喜结良缘,幸福美满地过一生,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那样。夏洛蒂不忍违拗她世上仅存的亲人的心意,又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结果便写成了读者现在看到的尾声。伊曼纽埃尔从西印度群岛回国,就在轮船驶近国门的时候,忽遇狂风暴雨,归舟不幸触礁沉没。这就完了。这位男主人公究竟遇救脱险没有?他和露西究竟得庆重逢、终成眷属没有?夏洛蒂放下笔来,不作交代。这个生死未卜、吉凶难定的悬念推给了读者,包括她的父亲。她在1853年3月26日写信给那位出版家史密斯先生说:“反正总得在淹死和终成眷属之间进行可怕的抉择。那些慈悲为怀的读者……当然会选择前一种较为温和的命运——让他淹死,以便解除他的痛苦。相反,那些狠心肠的读者就会……残忍地、冷漠地让他同那个人……露西·斯诺——结婚。”

阅读一部文学名著会被它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即使对作者生平和创作背景不甚了了,也能够兴味盎然地尽情欣赏的,正如《简·爱》问世,万众传阅,却还不知作者“柯勒·贝尔”是男是女。《维莱特》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同样有着这样的艺术魅力。不过,《维莱特》更接近于作者后半生的自传,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夏洛蒂的生平故事,那就像游览名胜古迹事先作一番研究一样,会跟着我们所钦佩、所爱戴、所同情的作者同呼吸,共命运,想作者所想,爱作者所爱,悲作者所悲,乐作者所乐。

因此，译者不惜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追踪和整理出夏洛蒂的心路历程来，觉得这样对于我国一般读者阅读此书将会有一些帮助。

夏洛蒂为她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的作品再版，于1850年写过一篇关于她们的回忆录。其中写道：“当烈日方中，农事正忙之时，耕耘者却在劳动中倒下了。”不料夏洛蒂本人也是这样倒下的。综观她的一生，有过事业成功，生命大放异彩的时期。她的爱情最后倾注到那位“不是富有诗意的”、但是真诚爱她的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身上，并且在她这位丈夫的祈祷声中死去（据朱虹、文美惠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所载，夏洛蒂是患妊娠败血症病逝的）。她最后一年的生活也可以说夕阳辉煌，金光灿灿。这正如夏洛蒂在写《维莱特》的时候说的那样：“（作者）的天空并不总是风和日丽，也并不——谢天谢地！——总是暴风骤雨。”然而，整个说来，夏洛蒂所尝味的人生是苦多于乐。面对死亡、长守孤独、恋情无所寄托，为寻找出路而拼搏；她心灵的负担实在是非常非常沉重。这些，在《维莱特》的许多篇章里都有催人泪下的反映。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最能打动人心，《维莱特》正是这样一部小说。西谚有云：“受创伤的牡蛎用珍珠来修补它的介壳”（It is the wounded oyster that mends its shell with pearl），《维莱特》正是这样一颗永放光彩的不朽的稀世之珍。

无怪乎盖斯凯尔夫人在为夏洛蒂写的传记中说道：“《维莱特》受到异口同声的一致欢呼。”女学者兼作家乔治·艾略特在书出版两星期以后便说：“我刚刚回到自己周围真实世界的感觉中来，因为我刚刚读完《维莱特》，这是一部比《简·爱》更了不起的书。”为勃朗特三姐妹编全集的玛丽·沃德说：“这种诗的想象力的伟大天赋，她从来没有像在《维莱特》里运用得这样好。”小泉八云^①认为：“《维莱特》[比《谢利》]更好，说实在的，我常常禁不住要想，它甚至比《简·爱》还要好……”近代勃朗特研究家、作家玛格丽特·莱恩说：“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更精彩、更成熟、更老练……也是唯一的一部几乎从头到尾显示出夏洛

① 小泉八云（原名 Lafcadio Hearn, 1850—1904），日本作家、翻译家。生于希腊，长于爱尔兰，求学于英、法。十九岁去美国，当记者，发表作品。1891年在日本与小泉节子结婚。1895年入日本籍。写作题材极广，有小说、游记、诗、散文、评论，并大量介绍和翻译日本风俗、宗教和文学。

蒂·勃朗特在最佳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

《维莱特》自出版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在国外,对于读者和研究者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国翻译介绍当以伍光建的译本为首,那是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名为《洛雪小姐游学记》。另外,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素台翻译的《维莱特》。西海(杨之宏)先生和我合作的这个译本当为第三个译本。我们自1987年开始,孜孜矻矻,不觉经过了五六个寒暑。其间固然有其他审稿、译稿以及疾病等等事情干扰,不得不暂停译笔,但是原文本身不易翻译,必须仔细推敲斟酌,也是一个原因。萨克雷觉得夏洛蒂“比多数女士们更精通英语……文体可说极其浓郁,极其纯正。”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她在选词用句上十分讲究。……一组词语,就是如实反映她思想的一面镜子,其他的词,不论含意多么接近,都不能取代它们……这种仔细推敲遣词造句,使她的文体显得像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么细小,都安插得天衣无缝。”作为译者,面对这样一件精雕细琢、长达六百多页的艺术精品,要用另一种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说一声戛戛乎其难哉,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过分。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地写;译者则必须体察入微、亦步亦趋地译。中国的方块字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其表达能力决不亚于任何其他文字。不过,要把夏洛蒂那样完美的西洋镶嵌图案惟妙惟肖地临摹出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读者看过这个译本,或许可以多少体会到译者所费的苦心。但是“天衣无缝”则是我们望洋文而兴叹的事。

西海先生和我分译互校。我译前面一半,并且担任全书中文润饰工作,以求笔调的一致。西海先生校正了我译文中的疏误之处。杨又才、吴成艺担任了枯燥的誊抄稿件的任务,在此谨表谢意。

书中注解是参考注释本原文和许多各家作品及中外文工具书编写的。

评论家认为,了解夏洛蒂的作品要和了解她的生平联系起来。为此,本书附有一份夏洛蒂生平大事记作为附录一,以便读者参考。

这篇序言之中的某些引文引自国内有数的勃朗特研究家和译者杨静远女士和祝庆英女士、祝文光先生的编译和翻译的作品。这些作品名称已编写在书后的附录二之中,那是一份我国对于勃朗特姐妹的作

品生平的翻译、研究的书目,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作进一步的欣赏和研究。附录二里,有些材料是彭崑森先生提供的,感谢他费心代为搜寻。限于见闻,想必尚有挂漏之处,望请读者和专家指教,俾便来日更正和增补。

吴钧陶

1992. 7. 2.

这部译稿全部审阅完毕，正待发稿之时，译者之一西海（杨之宏）先生不幸于1992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七十五岁。他和我从1955年起在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同事多年。后来反右时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们举家迁往宁夏。1981年，拨乱反正之后，他又和我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他与我谊在师友之间，他的溘然去世，使我深感悲痛。杨之宏先生十六岁时到英国留学，二十一岁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回国，曾任英语教官和大学英语教师。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出版界，译著有《天路历程》等文学作品。当年他们迁往宁夏，我们一别就是二十多载。在那些非常年代里，他先在中学当图书馆管理员兼为学校抄写教材，后来专司敲上下课的钟之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到农村，在农田劳作整整十一年，常常食不果腹，健康遭到严重损害。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耐心，也许还仗着他的宗教信仰，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全家才在上海团圆。他正直、清白、善良，待人坦诚、宽厚。凡认识他的人，都会认为这决不是溢美之词。愿他在天之灵得享安息！

“故人云散尽”，我想到林同济、孙瑜、孙梁、方重各位先生都已先后离开人间；“吾亦等轻尘”，我想到自己不知还能笔耕到几时。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将永远记着他们，并且学习他们孜孜不倦工作直到最后的精神。

杨之宏先生不能亲眼看见这部译书的出版了，但是他所费的心血将随同原作者所作的卓越贡献而遗留在世上。或许，这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在活着的时候最足以自我安慰、也是死后他的追念者心中的悲痛和遗憾稍得以宽解的一件事。

吴钩陶
1992. 12. 1.



这个译本出版许多年以后，出版社计划重印。杨之宏先生的女儿又才女士（《大众医学》杂志执行主编）和我将全书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订。附录部分的“生平大事记”也稍作补充；“中文本书目”则由又才女士请人查找增补这些年新出的书籍目录。

新千年的三月初，我突然患病住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两星期。住院期间断断续续阅读此书，不时想到两年多前的秋天（1997. 9. 20.），同事三十余载的祝庆英女士正是在此医院大楼内病逝，不禁感慨系之。读者将会因为她翻译的《简·爱》、《爱玛》等名著而怀念她吧。

吴钩陶

2000. 4. 5.

